

---

# 关于《中国复兴枢纽 ——抗日战争的八年》

张振<sub>昆鸟</sub>

---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出版了，在浩繁的抗日战争文库中又增加了一本新著。本书由刘大年、白介夫同志主持编写，众多学者先后参加撰稿、改写、补写，历时数年，在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前夕完成问世。缅怀抗战先烈，此书谨作为一份微薄的献礼。

对于这样一本新书，人们首先关心的必定是：它有新东西吗？有什么新内容吗？有新意或精义吗？写法上有创新吗？等等。这些都应由读者去评估、去鉴定。根据我近两年在刘大年同志直接、具体指导下工作所见，本书尽量避免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它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想有所开拓，自有特色。本书的要求是：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主要过程，表达这段历史的基本内容，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不要有大的偏颇。在这样的要求下，全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叙述。

## 一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后者服从前者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是民族矛盾，二是阶级矛盾。这两个矛盾都是早就有的，不同的是它们的地位的变化。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加在中国头上，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压倒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最主要的矛盾。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成为中国各阶级最紧迫的任务；国民党、共产党调整关系，从多年的内战对

峙转变为共同抗日,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由此,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这个定位就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1939年以后国共间的矛盾又表面化,在西北、华北许多地方发生摩擦,1941年皖南事变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出现一种新的复杂状态。但国民党终于在分裂内战的边缘停了下来,从“彻底制共”的打算上退了下来;共产党仍与国民党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说明还是民族矛盾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前者支配后者,后者服从前者。抗战八年间一切斗争都与这两个矛盾紧紧联系着,认识这两个矛盾及其地位、作用,是认识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 二 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后者加强了前者

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这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特点。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人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共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世人早已熟悉并接受的各种提法都表达了这一层意思。需要明确认识的一点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参加而实现的。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掌握着全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被各方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政权参加抗战,中国民族就仍然是分裂的民族;有了它的参加,就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各行各业各界以及海外华侨都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但国民党实行的是政府抗战,事实上不但不发动人民抗战,还往往限制人民抗战,越后来越压制人民起来抗战。所以它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民族战争,不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与敌人作战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实现在敌后战场上。

这里有两条抗战路线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出现了两种抗战主张。一种是共产党提出的,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积极贯彻这种主张,大力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充分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真正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本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这就形成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另一种是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只要军队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这形成一条片面抗战路线。这两种抗战主张、两条抗战路线体现在抗日战场上,敏锐的外国观察家很快就感到摸到了。一位美国军官卡尔逊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深入于八路军之中,对山西中部及晋冀边区正在开展的敌后游击战及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评述道:“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对手的军队……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法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这显然是困难的,因为许多国民党官员同共产党人尖锐地对立,他们不肯采纳后者设计的任何计划……我在考虑,蒋介石是否愿意用八路军领导者们实际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教育他的下属?他会愿意动员人民起来抵抗吗?他会愿意给予人民以公民权和社会平等以调动他们无限的忠诚吗?”(卡尔逊著、祁国明等译:《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页)这里他已体察到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随后他又去台儿庄前线观战,去晋、冀、鲁的许多地方对敌后斗争做实地考察,感受更加深切,又评述道:“我时常与(国民党山东省)省长(沈鸿烈)和八路军的孔团长交谈。我可以看出,在省长代表的国民党和八路军之间,由于对省内发展抗日力量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同,产生了一些摩擦。省长坚决反对人民组织起来,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他对我说:组织文化团体我无异议,但国

国民党是执政党，人民必须遵从它的决定。’他说政治和军事权都赋予了地方行政官员。他计划在每个县和每个行政区都建立武装，使这些区的官员用以应付局面。另一方面，八路军的态度是：只有通过改善人民的福利，向他们讲解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教育他们有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求得他们的合作，把人民的抵抗力量发挥到最高水平。看来，这两种观点是不能和解的，但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为了打败共同敌人而不得不进行的合作缓和了国共两党的态度。”（《中国的双星》，第232—233页）一个是“坚决反对人民组织起来”，单纯由政府组织军队去抗战；一个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求得人民的合作，“把人民的抵抗力量发挥到最高水平”：这是清清楚楚的两条抗战路线。八年间，片面抗战路线指导着国民党统治区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全面抗战路线指导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及敌后战场的抗战，两者都是民族战争，后者又是人民战争。

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是一致的，又有所区别。其一致处在于都是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不同处在于人民战争以兵民为本，不是单纯的军队作战，还有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的积极参加。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是民族力量的源泉。战争伟力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投入对敌斗争，抗战就有了深厚的力量根基。它能抗击任何力量，而不会被任何力量所摧毁。归根结底，人民战争是民族战争的坚实基础，它从根本上加强了民族战争。中国最后胜利，是靠民族战争胜利的，也是靠人民战争胜利的。

### 三 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决定抗日战争的进程和面貌

抗日战争在中国在整个东方世界都是空前规模的大战。如同一切战争一样，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表现和决定于战场上的较量和角逐。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在于不只有一个战场，而是同时

有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其他战争都不曾有过的。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连结到一起，统一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成为抗战八年的历史主线，决定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和面貌。两个战场又统一，又相区别：两者互相依托，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统一的；两者各有不同的领导（这两个领导相互间又联合又斗争），有不同的作战方法，彼此间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斗争。两个战场的运动都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全局，一是对日作战军事上的全局，二是全国政治局势、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对比的全局。所以正是这条主线的变化中显示出抗战全过程的不同阶段性。大体说来，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推进，正面战场从华北扩大到华东、华中、华南，敌后战场也随着在这些地方出现。正面战场这时是整个战局的中心和政局重心。这是抗日战争的前期。武汉会战结束后形势一变，战局转入相持，正面战场还不断有一些战役，但再无武汉会战那样的大战；敌后战场则迅猛展开，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这使日军不得不把部分兵力转到敌后战场，并从国内向中国增兵。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时地位、作用逐渐相近。这是抗日战争中期。1944年初，敌后战场抗击、牵制在华日军的比重已大大超过正面战场，4月以后正面战场豫湘桂大败，后方区域更加缩小；敌后战场相反，正在开展攻势作战，解放区渐增至一亿人口。两个战场的地位发生新变化。这个变化很快反映为政治领域的新变化，共产党的力量上升，国民党的力量下降，它大失人心，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政治力量的重心逐渐演变，形成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重心并存。这是抗日战争的后期。本书把抗日战争八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根据就在这里。

#### 四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中国战场的格局是自己决定的，胜利是靠自己取得的

中国八年抗战,前四年半是单独对日作战的。那几年间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世界法西斯主义肆虐亚欧,中国处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高举抵抗侵略的旗帜,依靠自己的力量顶住近代化武装的日军的野蛮进攻,并坚持下去: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全力抗击东方法西斯的国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国战场与盟军对日作战联结了起来,有了盟国的支持与协同,中国不再是孤军作战。但中国抗战两个战场并存及其演变的格局并未因此而改变,这个格局仍然是中国抗战自身决定的。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的抗战得到盟国的援助,也支援了盟国的对日作战。中国抗战的命运与盟国对日作战的命运联结到了一起,中国抗战的胜利也与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融而为一,中国与盟国共同打败了日本,但中国抗日战争终归是靠自己坚持到底,取得胜利的。

## 五 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统一与矛盾, 后者服从前者;新与旧,前者最后起作用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思想、基本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又给予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影响。司马迁《史记》专列《孔子世家》一篇,强调讲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是他全面认识社会历史的深刻见解之一。从那以后,历代“正史”在《儒林传》等篇章中把纪述儒家学说、文化状况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容。这说明人们认识到精神领域与实际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广义的文化范围甚为宽泛,文学艺术、学术理论等都包涵在内。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是中国全民族解放斗争总体战的一条波澜壮阔的战线,它与整个抗日战争的面貌、进程相联系,反映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呼唤民族觉醒,表达民族精神、群众觉

悟,又反过来启导、鼓舞人民增强抗战意志,弘扬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忱,这是支持全国几亿人前仆后继、坚持抗战的灵魂。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领域又呈现着复杂的情景,它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这是因为这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对外的民族矛盾,一是国内的阶级矛盾:不同的著作当其涉及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时,是统一的,都拥护抗战,支持抗战,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呼号呐喊、鼓吹论证;不同的著作当其涉及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时,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与冲突。在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的抗战总形势下,文化思想领域这种统一与矛盾的并存并不是平衡对峙,而是统一为主,分歧、冲突服从于抗战大局,矛盾服从于统一。但这里的矛盾并非不普遍,斗争并非不激烈。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理论等许多问题上,对立观点都表现得极其鲜明: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与之对立的各种旧观点,它们相互间的斗争表明,前者可以深入认识、发掘民族精神,启导群众觉悟,最适合抗战的需要;后者在整体上主要地不是适合抗战的利益和需要,而是这样那样地适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这是抗战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中的新与旧的斗争。八年的争论、斗争显示出:旧东西的力量不断削弱,影响不断缩小,新东西不断发展扩大,最后将起作用。

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战线在支撑抗战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在当时的现实斗争中产生过巨大的物质力量,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八年的文化思想不可能按年代顺序分阶段去讲,只能置于全书最后做综合概述。

以上五条或五个关系,都是抗日战争的基本内容、重大问题,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是表现抗战的全过程的;本书就是以此为纲要写成的,其中第一条可以说是总纲或纲中之纲。按照这几条纲要撰写抗日战争的历史,是由于它们是时代、事件的本来面目,基本的相互关系。抗日战争是中国亿万人参加于其

中的一场移山倒海运动,矛盾复杂,头绪何止万千,无论人们用多大篇幅去描写,永远也无法一一恢复其原状。历史书有各种写法,形式格局在人创造,只要合乎事实,反映历史本质,就自有价值,成一家之言。但又要让人窥见抗日战争八年的全貌,又要让读者容易了解其中的要领,不至于在广泛的事件中感到茫然,则可以认为本书采取的写法也许是比较可取的。

本书围绕上述几种关系叙述各种有关史实,或者叙述各种史实来体现这几种关系,基本上采用叙事纪实。有时夹叙夹议,议结合于叙事之中,对事情略加点评,仍以叙明史实为依归。有一些问题,夹叙夹议还有所不足,就集中加以分析评论。现举几处主要的分析评论如下:

关于国共两党在如何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问题上认识、主张的异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认识、主张基本一致的一面,是都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都用不同的提法主张国内各种力量团结;军事战略上,都主张持久战,反对速胜论,亡国论。国共两党主张不一致的一面,则是国民党强调政府抗战,不敢不愿发动人民抗战。蒋介石谈话说,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国民党正式文件上规定要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但那只是纸面上的东西,事实上是压制人民起来抗战,许多地方与民众处在对立地位。对于国内的团结,国民党拒绝在法律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其他党派法律上的合法性,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军事上的‘持久消耗’战略,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核心口号,缺乏正确的作战方针作为基本支撑和内容,本质上是一种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共产党的主张不同,核心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国共两党对如何夺取抗战胜利的一系列主张、认识不同,实际上是对于谁是抗日战争主体和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应该各自摆在怎样的地位的主张、认识不同。越往后,两种主张和认识的不一致,就越来越明显地

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冲突叠起。

“中国被灭亡的危险，规定了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所以国共双方主张一致的一面，最终是起主导作用的一面。双方的矛盾斗争反映了阶级矛盾存在的客观现实。阶级矛盾这时是居于第二位的，所以两条抗战路线的矛盾斗争，也仍是居于第二位的一面。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进行下去和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结合在一起，加上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使历史的车轮开始了改换方向。中国近代由百年衰败重新走向复兴，它的真正转折点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形成的。国共两党及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如何夺取抗战胜利的主张和认识，都不可能那么具体地预见到后来发生的种种，它们的主张和全力以赴的活动又都在中国自身范围内准备了后来发生的种种。”

**关于平型关胜利：**“平型关告捷是八路军出师后第一个胜仗，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取得胜利的歼灭战。这时是抗战初期，国共双方正齐心对日抗战。平型关究竟歼敌多少，毛泽东给朱德的电报特别指出，对蒋介石应如实报告，不要夸张。蒋介石致电朱德嘉奖，也是诚意，并非虚情。他们都是反映了全国要求抗日的愿望。中国遭受日本多年的民族压迫，积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抗敌雪耻怒火，这时正猛烈升起，要求举国共同御敌，快打胜仗。平型关捷报的报道宣传和淞沪战争中八百壮士等报道宣传一样，就是反映了全民族的这种共同愿望和炽热激情。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横冲直闯，气焰异常嚣张。平型关一仗，灭侵略者的威风，长中国人的志气。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打击了日军骄横疯狂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勇气和信心。这是实在的。”

**关于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使正太铁路停运一个多月，同蒲路北段、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大部分公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打击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百团大战歼灭大量的

日伪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蒋介石也发电嘉奖：‘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的意义，首先它是一个标志，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壮大和成熟起来了。各根据地是被分割分散的，百团大战表明，它又是高度统一的。这场作战主要在华北进行，加上华东、华中，这个战场不但地域极其辽阔，它所牵制、抗击的日军侵华兵力接近半数，此外，还有几乎全部伪军。从这方面看，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已经或者正在接近正面战场的地位。这表明了有辽阔、牢固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才能够相对稳定下来，中国的持久抗战才能够坚持下去。在政治上，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万难、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的意志和胜利信心。大后方人民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无时不希望战场上出现某种奇迹，百团大战消息传开，在久被封锁的人们看来就是这样一个奇迹。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增高了。同时，八路军这样规模的作战，在国际上也逐渐产生相当的影响。”

**关于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建立伪政权：**“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建立傀儡政权，充当日本灭亡中国的走卒，它的重要性不在其人其事，而在事情表现出的反应和结局。汪在国民党内长期居于高位，自成一股势力，蒋介石也要与之合作来加强统治地位。汪一旦公开投敌，立即遭到从国民党到全国人民的声讨唾弃，陷于彻底孤立。日本最初积极炮制汪记‘国民政府’，是以为它能够欺骗一部分中国人，分裂抗战阵营。但不久就发现，民众对它不信任’，不起多少作用，计划失败了。裕仁天皇三弟崇仁1944年在南京同一部分中下级军官讨论战争形势，汪伪是他们着重谈到的问题之一。军官中有说‘国民政府成立过早’的，有说‘国民政府没有实力’的，有说‘国民政府没有吸引力’的等等。崇仁分析说，它为什么没有实力，这不正是因为民众对它不信任吗？那么，为什么民众对它不信任呢？寻本溯源，国民政府，与其说是日本真正为中国着想，为了拯救

中国民众、完成国家统一而建立的政府，毋宁说更富于这样的色彩——即当时的日本为掩饰其备受诸外国责难的侵略主义，而灵机一动施展出来的一种小伎俩而已。’其下层的官吏、军人等，大部分都是由抗战意识薄弱份子、或想利用日本发财而日本又被他们表面上空喊的亲日所蒙蔽的一伙人构成，这就毫不足奇了。而民众对这样的政府不予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陆军省主管此事的某要员说，建立国民政府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日本内部的这个评判是很说明问题的。沦陷区广大人民群众即使在日军刺刀威胁下，也拒绝支持打着‘和平反共建国’之类旗号的汪精卫一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在这里起作用，日军深入国土，国破家亡人民遭受屠杀，尸横遍野的现实更在这里起作用。日本可以搜罗一群民族败类替它镇压控制民众，但终究无法征服中国民心，无法改变中国的民族性格。汪精卫一伙投敌，没有动摇、削弱抗战营垒，反而使抗战营垒更加明朗了，使抗战舆论掀起了新的高潮。汪伪与日本签订的《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及《基本关系条约》也很值得重视。日本坚持要建立的‘东亚新秩序’，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什么货色，《协议文件》描绘出了它的面目。日本外交官里有人讲得很明白：所谓新中国者，亦即第二满洲国。’《协议文件》如果见诸实施，中国就将成为‘准满洲国’。用不着几天，再挪动一下棋子，中国就是‘第二个满洲国’。所以这个《协议文件》虽然最终是一张废纸，对中国人仍是有教益的。汪精卫在那个文件上签字前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前一句是说中国不是日本所能够征服的，后一句是说中国不是任何卖国贼所能出卖的。穷途末路逼着他说出了两句合乎实情的话。”

**关于皖南事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间的斗争重新加剧，从分散磨擦一直发展到皖南事变这样规模的军事对抗。这表现出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处在一种新的复杂状态中。共产党在

抗战中势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则决定要限制阻止共产党的发展。这是双方矛盾斗争重新加剧的根源和实质。各次大的军事对抗都是国民党方面发动的,各次大的军事对抗结果,又都是国民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军事失败,政治上丧失人心,皖南事变除了消灭新四军在江南的部分,其他也无所得;共产党方面反而实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归根到底,这是阶级矛盾现在是受民族矛盾制约的。国民党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发展,以至准备‘彻底制共’,但毕竟要在分裂内战的边缘上停止下来,不能再走下去。共产党从日本占领的地区发展力量,这本来是别人无法反对的,但它也受到自身和周围环境条件限制,要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联系合作。于是,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形成了一个公式:联合——对抗——联合。这是全部国共关系中此时特有的一个公式。国民党凭借掌握全国政权的实力,极力要控制与国共有关的局势,而局势不断突破它的控制;共产党一直遭到来自日军与国民党方面的双重封锁,但又在那种封锁中不断发展起来。历史在这里表现出人民的地位和新的走向。”

关于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从主要方面看,是中日战争的延长和扩大。先有中国的抗日战争,然后才有太平洋战争。它们是由两条线组合在一起的。一条线是从卢沟桥到太平洋。日本所以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中日事变’,即把美国赶出中国和亚洲,来结束中日战争,实现其所谓‘东亚新秩序’。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日本与中国都是一回事:在日本,都是为了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行的战争;在中国,都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地区扩大,时间延伸,性质没有改变。再一条线是日本与美国争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利益的战争。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利益基本阵地。日本要求美英‘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新的形势’,即承认日本独占中国。这与美国坚持牢固立足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针锋相对。美国不惜根本牺牲中国抗战,寻求与日本妥协。但日本坚持在中国驻兵,美国

接受这一条，等于撤出中国，放弃太平洋。而且美国的最后妥协方案，遭到中英澳荷的一致反对。中国加上东亚大陆、太平洋，就成了日美战争的场所。但美国在站队的问题上与日本相反，它是站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两条线性质不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连结为一条战线，一个阵营了。日美两国当初都没有料想到或者没有真正打算实现的全面对抗终于发生了。这里只有一个力量是决定性的，这个力量就是中国长达四年半的独力持久抗战。中国独力持久抗战迫使日本在战争中向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走下去。”

**关于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大后方民主运动，是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共产党力量日渐强大的背景下出现的。许多人为此奔走呼号，以至付出鲜血生命。它的活动和影响主要限于知识分子、中间阶层，与敌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民主运动不足以相比。但它仍有很大的重要性，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民主斗争所不能代替的。这个重要性，一是多少限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利于全国坚持团结抗战；二是它的号召不少地方与共产党一致，增强了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三是中国从此一个有组织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舞台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在中间势力中削弱。这是最新的社会动向，也是历史的动向。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化、国内政治力量向有利于人民革命转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及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秘密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一是损害中国主权的；二是美苏两国拿中国利益互相交换，划分势力范围，强制中国就范的；三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支持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不利于中国人民革命的。罗斯福与斯大林，很难说谁对谁的让步更多一些。按照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以后失去的在远东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美国则由于影响力强大的苏联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等于承认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而

得到满足。因此协定是美、苏在东亚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根据协定苏联按时出兵，加速了日本彻底失败投降，这是协定的正面意义。”

“中苏条约的签订落实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规定。它是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出让民族利益，换来的是维持它的统治利益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一条约，蒋政权取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对国民党战后维护其一党专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中国战后政局终究没有像美国和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也没有照苏联设想的那样发展。美国尽其所能地参与干涉，人所共知。苏联不但不支持中共，而且斯大林一再劝告中共，要与蒋介石谋求妥协，解散自己的军队，也就是中国革命应该就此止步。斯大林不久以后对人说：中国同志在这里的时候表示同意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回国后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中国局势当然要受周围环境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共是一个大党，中国前进的道路终究是靠中国人民自己开辟出来的。”

**关于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分歧与斗争：**“综观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分歧与斗争，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这些分歧与斗争是抗日战争这一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斗争的反映。经过讨论与争辩，旧的东西顽固坚持自己的地盘，但其力量明显衰微；新的东西虽然尚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已明显获得中国人民中更多人的理解、同情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和发展，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基本完成，并由知识分子领域扩展到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层面，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抗日战争中人民力量的兴起强大，在实际力量上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作了准备，这时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中国化，则在思想理论上为新中国替代旧中国作了思想的准备。”

这样的分析，目的在于揭明一些重要问题的实质，讲清其中的道理，反映历史的真面貌，希望对读者能有所帮助。这种写法在以

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似尚不多见,关于本书有没有新东西、新意等等,只须读读这些分析评论,新不难想见几分了。至于这些分析评论本身,如同全书及其任何部分一样,当然都是可以批评讨论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史是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项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要前进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条是,抗日战争的基本面貌虽然已经清楚,许多事实却仍若明若暗,例如不少基本数字至今尚付阙如,有的数字出于粗估或以讹传讹,这些都直接影响叙述的准确性;有些史料真伪杂陈,使用者各取所需,造成种种混乱。事实不准确,研究分析就缺乏坚实的根据。因此,厘清事实还是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个工作困难是很大的。再一条是,抗日战争的性质虽已昭然,但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不深刻的地方。不断深化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要克服种种困难,把抗日战争的研究推向前进,必须使这段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对象,必须把这项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这应当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本书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新尝试,是否有所成就或者有几分成就,当由专家检定。本书从集稿到付印迁延甚久,定稿时间比较仓卒,目前仍较粗糙,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请专家和读者给予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荣维木)